

宋型文化下的社交生活与词体演进

王伟伟

(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宋型文化。宋型文化的建构影响了“举世重交游”的社会风气。宋词就植根于这种繁盛的日常社交生活中,成为了时代的代表文学样式。宋型文化影响下的社交生活推动着词体的发展演变:游戏酬唱的交游生活影响了词体的娱乐定位;祝颂生活强化了词体的应用功能;同气相求的交游唱和推动了词体发展的多元转向;交游之风的恶化导致词作交游中的逞才斗气,词体写作脱离日常社交生活,走向衰落。

〔关键词〕宋型文化;社交生活;词体;演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5)06-0122-06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质的宋型文化。宋型文化的独特建构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日常生活,并在社交生活中得以集中体现。宋代歌词就植根于日常社交生活的肥沃土壤,融视、听、赏、作于一体,成为时代的文艺“新声”。词体的赏作活动成为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宋代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宋型文化下的社交生活影响并推动着词体的发展演进,词体的兴衰嬗变丰富发展着宋代的文化空间,宋词成为了一代之文学,也成为我们考察宋代文化建构的一个窗口。

一、宋型文化影响下的社交生活与词体赏作

与前代的文化形态相比,宋代文化呈现出文化阶层间流动互渗的鲜明特点。不仅在精英文化内部,打破士庶之隔,出现了从进士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转变,而且,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宋代平民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在经济上,市民阶层是物质生产的重要推动者,在政治上,平民阶层走进“品官”行列,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平民阶层迅速壮大,他们积极寻求并参与着社会的精神文化创造,平民文化的崛起成为宋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动态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宋代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宋型文化下多种形态的文化相互交融,呈现出“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靠拢,通俗文化向精英文化渗透”^②的新质特点。社会新阶层的崛起、文化阶层间的交流碰撞影响了这一时期社交生活的兴盛,而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则为社交生活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举世重交游”^③成为两宋时期的社会风气。宋代的社交生活十分活跃,形成了繁复而独特的交往礼仪和交往习俗,比如相见礼节、待客礼节、交游风俗等等。宋代社交生活的盛行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渗透到社会其他各阶层,民间的日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宋词与宋代的社交生活”(项目编号:J11WD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伟伟,女,博士,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② 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③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四库全书本,卷7。

常社交生活同样热闹非凡。

喧嚣的日常社交生活亟需一种有别于传统诗体的新型社交文艺,用于交流和宣泄。独立于晚唐五代,集视、听、赏、作于一体的词体,适逢时代之需,开始走进大众视野,在宋代上下层文化交流互动的时代环境和氛围中兴起繁荣、演进嬗变,不仅承担起日常的交往功能,成为一种极具流行性和时尚性的社交文体,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了宋型文化的文学代表。

但宋词之所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并不仅仅因为对社交生活的参与和表现。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文学与社交生活的结缘并非始于词体,“诗可以群”就是对诗体与社交关系的揭示。从先秦时代开始,诗歌与社交生活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或隐或现地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交文学的发展始终,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诗作酬赠和外交赋诗,汉朝大量的诗文赠答,建安六朝文学集团的交游活动,以及唐人的以诗文拜谒觅求荐举。但这种传统诗歌对社交生活的参与,因长期困守在士大夫阶层,并在后继的发展中,堕入无聊的应酬,其趋炎附势的流弊,受到众人的棒喝。

直至宋代,宋型文化的特质建构影响了社交生活的文化转型,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流互动既造成了社交生活的繁盛,也带来了社交词体艺术的新质,与传统社交诗体相比,宋代社交词的世俗化特征明显,日常生活化色彩浓厚,它不再是一种案头的纯文本写作,而是借助音乐的体性和对日常生活触角的向下延伸,开始积极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社交生活,为社会各个阶层津津乐道,几乎成为人们日常社交生活中的一种通用文学语言。王兆鹏先生指出:“在宋代,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文坛墨客、家庭妇女、方外僧人、风尘歌妓、江湖好汉、民族英雄,无不参与词的创作。宋词的创作队伍,几乎涵盖了各种社会阶层,包括了各种社会角色身份。”^①借助多种乐器的伴奏和歌姬们声情并茂的演绎,词体突破了传统社交文体的阶层困守和应酬模式,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吸引着听众,成为时代的“流行歌曲”,呈现出全民化的特征。

宋型文化下的社交生活深刻地影响了词体的赏作活动,两宋时期的社交词作“共计 8867 首,占全宋词的 42.11%”^②。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交场合,表现了不同的社交关系,如感人良深的亲情、真挚浓厚的友情、缠绵悱恻的恋情,既有敷衍的应酬、功利的逢迎,也有消遣游戏的同乐交游和灯火相传的词学推进。承担了多种社交功能,如侑酒佐欢、祝颂答谢、迎来送往、寄赠唱答、调笑和催促等等。社交题材进一步多元化,如节序词、酒词、寿词、汤词、茶词、贺新楼落成词、贺人洗儿词、贺新婚词和催妆词等等。因此,繁盛的日常社交生活使宋代词体的赏作活动成为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词体的“繁衍发展及其作用与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基于或体现在非文学的或形而下的社会与文化活动中”^③。宋型文化影响下的社交生活不断发展变迁,推动了宋代词体的发展演变,也拓展和丰富了宋代的文化空间。

二、游戏酬唱:娱乐社交的词体定位

宋朝立国伊始,太祖赵匡胤就提倡:“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④,虽有其政治目的,却倡导了重享乐、好富贵的人生追求,开始冲决了传统儒家的“兼济天下”、“致君尧舜”的社会价值信仰,为此后宋代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做出了社会导向。

从北宋中叶开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富庶的物质经济和统一稳定的社会局面更是加速了这一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追逐世俗生活的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大城小邑,人声鼎沸,通宵达

① 王兆鹏:《唐宋词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② 王伟伟:《宋代社交生活的“新宠”——从宋代社交词的定量分析谈起》,《东岳论丛》2012年第4期。

③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44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2。

旦。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不仅注重阶层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开始寻求精神娱乐上的交游活动。于是,那些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兴盛起来,它们以满足人的声色享乐欲望为目的,融“赏、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为一体,集视、听、味、嗅、触生理快感于一身”,借以“获得全方位的娱乐与满足。”^①以市民阶层为先导,以注重享乐为主要特征的交游生活在全社会普遍流行,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调弦於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②。

商业文化对人欲的肯定和张扬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声色之好,士大夫之间通宵达旦、嬉游宴赏的例子不胜枚举,普通百姓也在繁华的城市生活中扩大了交际范围,出入于市井间的各种交际场所,举之无数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用青楼红袖、美酒佳肴吸引着他们趋之若鹜。社交生活突破了传统交游中以士大夫群体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体现出全社会集体狂欢的特征。

极具时代特色的日常交游生活亟需一种相应的文艺形式来宣泄和表现,士大夫们渴望一种娱乐文艺,帮助他们在游赏宴饮、世俗享乐的交游生活中助兴尽欢。市井民众也在寻求适合他们阶层审美趣味的文艺消费形式,即集体娱乐的通俗文艺。而以诗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学因被士大夫阶层长期垄断,浸染着浓重的政治道德色彩,打上了精英文学的烙印,显然无力承担这一时代的需要。曲子词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其声色并重的演出方式满足了这种世俗享乐的社会心理,直接诉诸耳目的现场传播使它具备了“集体消费”的特点,“传授同乐”的应歌方式更是进一步增强了现场交往的互动性。因而,词体迅速窜红,成为社交场合的“新宠”:“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③作词赏曲成为宋代日常交游生活和社交文艺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宋词在其发展伊始,就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独特印痕,在欢歌醉舞的世俗文化转向中找到了最适宜的发展土壤。它扎根于娱乐化的社交生活,开始了灿烂的发展历程,以游戏酬唱的赏作方式表现出鲜明的娱乐特征,与传统社交文学和晚唐五代词不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与“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相区别。在宋人的文学观念中,歌词与诗文有着鲜明的文体分野。范仲淹认为诗文当是应于风化的:“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④而歌词则是“嬉弄”和“游戏”,“此(词)在诸公非其至,多出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⑤,“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词)者,然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⑥。即使宋词在后来的发展中先后经过了“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艰难雅化,但是由娱乐社交生活孕育出的“娱宾遣兴”的词体观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南宋时期,辛弃疾作词态度依然是“苟不得之于嘻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⑦。

第二,以集体狂欢性和日常生活化与晚唐五代词相区别。晚唐五代是一个战乱分裂的时期,整个时代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社会理想失落使得文人知识分子逐渐对社会现实变得麻木和冷落,他们退缩到词曲吟唱、歌儿舞女的小天地中寻求情感抚慰。受制于这一时代,晚唐五代词的赏作活动主要集中在宫廷朱门和文人士大夫之间,审美情趣绮艳狭窄。而在宋代王朝的升平时代,词体赏作活动借助日益兴

① 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②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四库全书本。

③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四库全书本,卷6。

④ [宋]范仲淹:《奏上时务书》,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⑥ [宋]胡寅:《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3页。

⑦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页。

盛的社交活动,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它以娱乐消遣的文体特征、自由放纵的文学形式表现着当时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在全社会迅速传播,成为时代的“流行歌曲”,表现出全民狂欢性和日常生活化的时代特色。

第三,游戏化的文体特征与自由放松的娱乐精神。词体赏作活动扎根于日常社交生活,游戏的体性帮助人们摆脱了功利的逢迎与虚假的应酬,摘下了诗文教化的沉重面具,以最本真的方式贴近生活。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当时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为文方面,既曾长久的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而今竟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压抑与束缚,而纯以游戏笔墨做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宣泄的机会。”^①词作交往中的自由、宽松与随意替代了矜持、拘束与矫饰,成为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社交词的游戏往来营造了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消解着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帮助众人体验情感交流的乐趣,分享着生活的喜悦,激发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间真情的眷恋,娱乐性的词体呈现出审美化的表达,获得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三、祝颂应酬:应用社交的词体强化

宋代文化价值观的世俗化特征之一就是注重日常生活之需,看重现实的功利。这一特点影响了社会的审美时尚,艺术与生活充分接近并融合,在艺术领域,注重对日常生活题材的开拓和表现的特点日趋明显。起源于民间歌谣的词体,因更切近形而下的生活存在体验,承担起了诸多的世俗实用功能,这一特点在祝颂生活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祝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多种社交关系,具有较强的应酬实用性。两宋时期,借助对喜事进行祝颂的社交机会,以游戏相娱乐的词体赏作几乎传播和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社交场合,词体的实用功能在祝颂应酬的社交生活中得到强化。

祝颂生活中的应酬词作以应制词和祝寿词为主。应制词是奉朝廷或帝王之命而作,有围绕朝事活动颂颂的,有对祥瑞事件进行歌颂的,还有贺皇室成员生日,在日常宴饮与外出游赏中娱悦圣意的。这类作品承应制诗而来,虽然作品内容价值不高,却积累了词体写作的技法和经验,形成固定的模式,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推动了词体的应用化写作。祝寿词的赏作活动涉及面尤为广泛,从文人士大夫到市井平民,从家庭成员到亲朋好友,日常祝寿活动中处处可见词体赏作的鸿影。两宋寿词大约 2300 余首,占全宋词总数的 11%,虽然寿词的写作受制于祝寿双方关系的疏密,既有泛泛的应酬也有真诚的祝愿,但在生日宴会的喜庆氛围中,寿词的赏作密切了人们的感情,增强了情感的互动和交流。

祝颂词中还有贺人生子生孙、新居落成、及第升迁、入赘新婚和店铺开张等作品。贺人生子词以表达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和对主人祖上荫德的赞颂为主,如吕胜己的《点绛唇》“瑞气盈门”、郭应祥的《临江仙》“忆我归舟初系岸”、赵福元的《沁园春》“一剑凌风”等;贺人生孙词多表达对主人家几代同堂共享天伦的羡慕之情,如伍梅城的《贺新郎》(贺李簿生孙)“甲子头春雨”和刘鉴的《贺新郎》(贺臞翁侄生曾孙)“曾作莺迁贺”;贺新第落成和乔迁之喜的祝颂词作多描写新宅环境的优美和居室构造的巧妙,以此赞颂主人不俗的品味和高洁的情怀,如郭应祥的《点绛唇》“甲第初成”;还有贺酒店药铺开张的,如无名氏的《满江红》(贺人开酒店药铺)等等。

借助社交活动,祝颂词得以在社会广泛传播,其强大的实用功能推动了词体赏作参与社交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成为了两宋社会风俗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水照说:“词从一开始产生就是应用文学,只不过是自然形态的应用文学而已。”^②在宋词的各种类别中,祝颂词的应用性最强,它推动了词体应用写作从自然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强化了词体的应用功能,主要表现在:

① 叶嘉莹:《词学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②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第一,祝颂语辞的模式化与意象典故的固定化。通用的祝颂语辞中大多以“愿”、“祝”、“庆”、“祈”与“荣”、“福”、“富”、“寿”、“贵”等词汇进行组合,而不同种类的祝颂词中,又有各自相对固定的词汇用语。比如寿词多用“老人星”、“身健”、“千龄”、“百岁”、“长生”等语辞;赞美才华事业多用“经纶”、“诗书”、“英才”、“文章”等词汇;祝福功名前途的,多用“鸢飞”、“鱼跃”、“风虎”、“云龙”、“鳌头”等等。意象典故的运用也相对固定,比如寿词多用“蟠桃”、“灵椿”、“松”、“鹤”、“龟”等代表长寿的意象,为双亲祝寿多用“老莱儿戏”的典故;贺人及第多用“蟾宫”、“折桂”的典故;贺人生子多取“熊罴吉兆”典故;祝人富贵多用“汾阳”之典等等。

第二,夸张的修辞与仙化的手法。祝颂之中多有溢美之辞,夸张成为祝颂词作的基本手法之一。比如廖刚有寿词《望江南》:“九万鹏程才振翼,八千椿寿恰逢春。貂裘瞩公荣”;伍梅城的贺新居词《贺新郎》:“唐宋几年名阀阅,到此步高一步”。祝愿赞颂,极为夸张。仙化的手法是将所祝对象和所处环境进行仙化处理,渲染出浓重的神秘色彩。如把祝颂对象幻化成“谪仙人”,对之进行赞颂:“谪仙堕人世,香雾郁重帘”(王之道的《水调歌头》)、“瘦鹤与长松,且伴癯仙,久住人间世。”(李弥逊《醉花阴》),以此凸显所祝对象的不平凡。环境的描写也处处运用“如入仙境”的表现手法:“良月露浓仙掌润,郁葱佳气充闾”(无名氏《临江仙》)、“桂殿影寒,蓬山波阔,未似彩衣庭户”(李弥逊《花心动》),以仙化修辞手法营造神圣化的审美效果,达到赞颂目的。

第三,词作结构的程式化。祝颂事件的发生是祝颂词的写作动因,因此祝颂词的写作通常是围绕祝颂事件进行写作,主要用五种要素按如下顺序结构全篇:时间、地点(场景或环境)、事件、赞美、祝愿。以上五种要素或同时出现或只出现核心要素。如李昉英《摸鱼儿》“绕西园”是一首贺新堂落成词,先写时间的美好、环境位置的绝佳,再写新居落成之事,最后表达赞颂和祝愿。结构安排的程式化进一步强化了词体写作的应用性。

总之,祝颂词的写作在词汇、意象、典故和结构等方面都形成了固定化和模式化的写作套路,略知文字的人都可以依照这种模式作词。祝颂生活强化了词体的应用功能,应用化的写作方式又进一步推动了词作在人们日常交往生活中的广泛传播。虽然应用化的写作也会带来“皮相堆砌”的弊端,却密切了词作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突破词体专属娱乐言情一途,拓宽宋词对广阔生活的表现范围,吸引更多的作词者,加强词体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力。

四、同气相求与词体转向

基于对唐五代进士文化弊端的深刻认识,从宋初开始,不少有识之士就通过创办书院教育,反思进士阶层的无行堕落,着力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重建儒学传统,由唐代的进士文化转变为士大夫文化,追求“内圣”之境界,“外王”之事功。士大夫文化影响下的宋代文人集名臣、文人、学者于一身,这种由多重主体强化形成的“宋型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上诗歌和散文创作中的强烈社会参与意识、崇尚气节的士人精神,也突破了词之“小道”、“薄技”的文体藩篱,开始在词体本色的艳情、闲情之外,关注社会、国家和民生,秉持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直言国家恢复之大计。词体的这一发展转向从苏轼的“以诗为词”开始,初现端倪,在南渡时期的“临难不屈”中走向兴盛,并一直延续至宋亡之后。

苏轼的“以诗为词”迈出了词体转向发展的第一步,他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①的作词态度,出入于经、史、子、集,从内容风格到用调叶律,开始了全面的词体革新:他突破音律束缚,以意为先,使词从“昵昵儿女语”走向了“划然变轩昂”的广阔天地;将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相结合,提高词品;“凡耳目之所接”,皆入之于词,又融理入情,扩大并深化了词的意境;词风清旷,在刚柔之外,自成一体。开辟了宋词发展的新方向,形成苏轼一派,影响后来词体的创作和发展。冯煦为《东坡乐府》作序云:“东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90页。

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旂;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轂。唯其所之,皆为绝诣。”^①以黄庭坚和晁补之为代表的苏门弟子,在与苏轼频繁的诗词唱和中,追步老师的词体革新,在思想内容、艺术体貌和审美情趣方面与苏词有很多相近之处,但又并非亦步亦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共同推动了词体的多元化发展。

受制于北宋时期保守词学观念和党争之祸的影响,苏轼词派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南渡时期。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社会的歌舞升平,人们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以吟唱歌词相与嬉戏的社交活动,逐渐从百姓日常社交生活中抽离,成为一个奢侈的话题。与北宋时期交游生活的集体狂欢不同,这一时期的社交生活具有鲜明的群体化特征,围绕词体赏作进行的交游活动,主要集中在反抗异族压迫的士大夫群体中,他们借助词作唱和互求友声,学习苏轼的以词言志,作词方式从应歌向应社转变。往日交游生活中的应歌佐欢和耳目之欲转向了忧伤悲凉和唱和之叹,相与唱和成为词体赏作活动的主要形式。唱和活动频繁,唱和形式不断发展,从传统的“一唱一和”、“自唱自和”发展为“一唱多和”、“连续唱和”和“反复唱和”等。如向子諲用《满庭芳》曲赋木犀一词,就得到朱敦儒、苏庠、徐俯、陈与义、蔡伸等多位友人的唱和,“同一花一曲,赋者六人”。葛胜仲作《江城子》“呈刘无言煮”一词后,叶梦得以《江城子》“甘泉祠殿汉离宫”与之唱和,随后沈与求又作《江城子》“华灯高宴水精宫”与叶梦得相唱和。

同气相求的词作唱和不仅推动词体从应歌向应社的转变,发展了词作的唱和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推动词体写作从“类型化”向“个性化”转向,在词体的创作方式、表现手法和审美风格方面孕育了词体发展的多元化因素。如忠义自矢的张元干,与之交游之人多为爱国志士、名公胜流,他们以秉持性情的唱和活动相互影响。芦川词慷慨磊落,清峭劲直,其寄李伯纪丞相词《贺新郎》“曳杖危楼去”最有代表性,类似的词人还有胡铨、李刚、李光等。他们的词作一洗嘲风咏月的轻儒衰惫之气,以豪迈气格和雄健文辞并举,其“刚风劲节,人所共仰”^②。而向子諲的唱和词则表现出对高洁品格的自许和对日常生活的津津乐道,他以“超然物外,自适其适”^③的人生态度化解现实苦闷,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都趋于日常生活化,与志士词人抒发高于生活的主体情感和志向怀抱不同,具有独特的作词方式和审美风格。叶梦得与友人的诗词唱和非常频繁,其唱和词作一方面汲取晋宋名士的精神力量,寄情山水,追慕雅士风流,另一方面又学习苏轼词作的达观清旷,“不仅词的‘韵制’得东坡十之六七,其生活态度也同样得其六七”^④,表现出对高标远韵审美理想的追求。

时代的动荡和家国的蒙难激励着词人们的主体精神,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交游活动增多,词作唱和高涨。词体创作出现时代化的转向,词人主体意识增强,词体赏作从应歌到应社,从类型化走向个性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五、逞才斗技与词体弱化

经过数次和议,南宋王朝得以偏安一隅,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相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朝廷开乐禁、复置教坊后,逞声色之好,逐歌舞尽欢的交游之风再次在全社会蔓延。但与北宋时期不同,孱弱的国势和频繁的外患影响了南宋交游生活的多样化和交游心理的复杂性。词作交游中既有沉醉歌舞、麻痹自己借以遁世的词作吟唱,也有英雄志士互相砥砺、立志恢复的交游唱和,还出现了落魄士子携艺以游、干谒权贵,带有寄食性质的新型社交关系。另一方面,南渡之后,以诗为词蔚然成风,词的

①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1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8页。

③ [宋]汪应辰:《文定集》,四库全书本,卷21。

④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品味不断提升,连一贯以道统自居的理学家们,也开始转变对词章的鄙薄态度,开始与词人交往,染指词作。多元化的交游生活和词品地位的上升促进南宋时期的词作唱和一度盛行,成熟型的词派和词社开始出现,以稼轩词派和江湖词派最具代表性。辛弃疾交游极广,他以词作为陶冶性情之具,其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镗,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极大地拓展了词体创作,形成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稼轩词派。稼轩派词人志同道合、频繁唱和,其唱和词作体现出对时代精神的共同响应,表现出强大的文学交往功能,与北宋时期歌词赏作多承担日常生活的交往功能有明显区别。但辛派流于粗放的作风和染指遂多、自成习套的词体发展困境,使得南宋词在后续的发展中,偏向于追逐词艺一途,词体发展的空间日趋狭窄。正如文廷式所说:“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②

江湖词派重视词体的艺术性,词社成员之间来往密切,围绕唱词作曲和词艺探讨开展词社活动。沦落于江湖的寒士身份使他们以作词为衣食之资,开始总结词曲创作经验,全面探讨词作之法,沈义父的《乐府指迷》记载:

壬寅秋,始识静翁于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
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
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则知
所以为难。^③

词社友人相与酬唱、交流切磋,围绕词体创作的音律用字、词法词风等艺术手法进行研究,词体赏作主要集中在文人手中,远离了日常社交生活的喧闹和沸腾,日渐沉落。

南宋后期,国势飘摇、经济恶化,政治的险恶使不少士人为满足私欲不惜丧失人格,人心叵测、士风败坏,“面誉背毁,心私迹公……踪迹诡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态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习也”^④。交游之风的恶变凋敝使得词作唱和主要集中在词社内部,以西湖吟社最有代表性,他们避谈现实政治和俗题琐事,通过切磋词艺、承传词法,追求雅士风流,总结词体写作的规范法度。自姜夔之后,杨缵、吴文英、张炎等人灯火相传,祖述词法,词风由率意渐趋法度。结社吟唱、分题而赋成为词社友人重要的交游方式,相互间的品赏切磋增强了作词活动的竞技性。词社成员之间夸艳斗能、逞学使才,过多地追求词体的形式格律与艺术技法,技巧有余情感衰竭,词体写作成为一门高雅的艺术创作,脱离了生机勃勃的日常社交生活,成为供文人雅士吟咏玩赏的一种纯文学化写作,宋代词体至此衰落。

[责任编辑:吕本修]

本刊责任编辑邮箱

宋协娜[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songxiena@sina.com

穆敏[党史]mumin@sddx.gov.cn

赵丽娜[经济、管理]zhaolina@sddx.gov.cn

吕本修[哲学]benxiu@sddx.gov.cn

魏磊[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weileiabc@126.com

谭建[党建、法学]tanjian@sddx.gov.cn

张蕴萍[经济、管理]yunping@sddx.gov.cn

裴传永[历史、文化]pcy1961@163.com

① 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2页。

② 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0页。

③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7页。

④ [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6。